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2015

重构国际投资机制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冼国明 葛顺奇 总校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2015

重构国际投资机制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冼国明 葛顺奇 总校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投资报告. 2015 : 重构国际投资机制 /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组织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310-04921-9

I. ①世… II. ①联… III. ①对外投资—调查报告—
世界—2015 IV. ①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910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85×21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493 千字

定价: 1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说 明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作为全球卓越中心，主要负责处理联合国体系中投资和企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已积累了 40 年的经验和国际专业知识，并建立了政府间协调机制，为超过 150 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报告中使用的“国家/经济体”是为了适当地说明领土和地区。使用的名称以及编排材料的方式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划分有任何意见。此外，国别名称的使用完全是为了便于统计和分析，并非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处阶段的评判。本报告所采用的主要国别名称沿用联合国统计处的分类，即：

- 发达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除智利、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共和国），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欧盟新成员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罗马尼亚），以及安道尔、百慕大、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圣马力诺。

- 转型经济体：东南欧国家、独联体国家和格鲁吉亚。

- 发展中经济体：泛指上述未提到的所有经济体。处于统计的目的，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AR）、澳门特别行政区（Macao SAR）和中国台湾。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报告中出现的公司及活动并不提供支持。

报告中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地图中使用的称谓，并不代表联合国官方认可。

报告中表格所用符号含义如下：

- 两个圆点（. .）表示没有数据或无法得到单独的数据。在一些案例中，如果某行的任何一项均无数据，则予以删除；

- —（—）表示该数据等于零或其值可忽略不计；

- 除非另有说明，表中空白表示该项目不适用；

- 年份之间的斜线（/）代表年，例如：1994/95，表示一个财政年度；

- 代表年份的数字间适用连接符（—），例如：1994—1995，表示参与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起始和终止年份；

- 除非另有说明，“\$”代表美元；

- 除非另有说明，年增长率或变化率均指年复合增长率；

表中数据和百分比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合计数与总计数不等。

本报告所载资料尽可引用，但需恰当注明出处。

序 言

《世界投资报告 2015》是这一系列丛书的第 25 本，旨在告知全球讨论未来国际跨境投资的政策环境。

今年的报告显示，由于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2014 年 FDI 流入下降了 16%，降至 1.2 万亿美元。然而，2015 年以后复苏迹象明显。目前，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 FDI 流量占外部发展融资的比重超过 40%。

《世界投资报告 2015》非常及时地借鉴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多数重要议题强调 FDI 重要性、国际投资政策制定和财税体制，以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议程和新进展。

《世界投资报告 2015》主要解决国际投资保护和促进方面的重要挑战，包括行使监管的权利、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投资者责任。另外，也审视了国际投资的金融政策，包括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通过避税引起的金融缺陷、以及离岸投资中心的作用。

《世界投资报告 2015》提供了一个国际投资协议体制改革的方法，以及一个国家间、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政策指导框架。它还提出了一套原则和指导方针，确保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的协调一致。

在此，我将《世界投资报告 2015》作为重要的工具推荐给在这关键一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组织。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鸣 谢

《世界投资报告 2015》由 James X. Zhan（詹晓宁）领导的工作组编写。工作组成员包括 Richard Bolwijn、Kwangouck Byun、Bruno Casella、Joseph Clements、Hamed El Kady、Kumi Endo、Masataka Fujita、Noelia Garcia Nebra、Axèle Giroud、Joachim Karl、Ventzislav Kotetzov、Guoyong Liang、Hafiz Mirza、Shin Ohinata、Sergey Ripinsky、Diana Rosert、William Speller、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oerg Weber 和 Kee Hwee Wee。

Jeffrey Owens 担任 WIR15 首席税务顾问并为本书提供很多建议。

研究和数据支持由 Bradley Boicourt、Mohamed Chiraz Baly 和 Lizanne Martinez 提供。同时得到了 Bekele Amare、Ana Conover Blancas、Hasinah Essop、Charalampos Giannakopoulos、Thomas van Giffen、Natalia Guerra、Rhea Hoffmann、Mathabo Le Roux、Kendra Magraw、Abraham Negash、Chloe Reis、Davide Rigo、Julia Salasky、John Sasuya、Carmen Saugar Koster、Catharine Titi，以及实习生 Anna Mouw 和 Elizabeth Zorrilla 的帮助。

Lise Lingo 担任编辑，Laurence Duchemin 和 Teresita Ventura 担任内容排版。

Sophie Combette 和 Nadege Hadjemian 负责封面设计，Pablo Cortizo 负责图标和地图的制作。《世界投资报告 2015》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 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Anne Bouchet、Nathalie Eulaerts、Rosalina Goyena、Tadelle Taye 以及 Katia Vieu 的支持。

在报告准备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本报告起草初期的专家研讨会阶段，工作组得益于外部专家的评论和建议，他们是 Wolfgang Alschner、Carlo Altomonte、Douglas van den Berghe、Nathalie Bernasconi、Yvonne Bol、David Bradbury、Irene Burgers、Jansen Calamita、Krit Carlier、Manjiao Chi、Steve Clark、Alex Cobham、Aaron Cosbey、Lorrain Eden、Maikel Evers、Uche Ewelukwa、Michael Ewing-Chow、Alessio Farcomeni、Michael Hanni、Martin Hearson、Steffen Hindelang、Lise Johnson、Michael Keen、Eric Kemmeren、Jan Kleinheisterkamp、Victor van Kommer、Markus Krajewski、Federico Lavopa、Michael Lennard、Jan Loeprick、Ricardo Martner、Makane Mbengue、Nara Monkam、Hans Mooij、Ruud de Mooij、Peter Muchlinski、Alexandre Munoz、Thomas Neubig、Andrew Packman、Joost Pauwelyn、Facundo Perez Aznar、Raffaella Piccarreta、Andrea Saldarriaga、Mavluda Sattorova、Ilan Strauss、Lauge Skovgaard Poulsen、Christian Tietje、Jan van den Tooren、Gerben Weistra 和 Paul Wessendorp。中东商业智库（MEED）也在搜集西亚数据方面提供了帮助。

同时，UNCTAD 感谢来自 UNCTAD 其他部门同事的意见，它们包括来自非洲部门最不发达国家

特别项目组、全球化和发展策略部门以及技术逻辑部门，作为内部同行评议过程的一部分，以及来自秘书长办公室的意见，作为审查和清除过程的一部分。联合国制图部门在地区地图方面提供了建议。

众多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对《世界投资报告 2015》做出了积极贡献。衷心感谢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政府提供的财务资助。

缩 略 词

ADR	非诉讼解决机制
AGOA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EAN	东南亚联盟
BEPS	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报告
BIT	双边投资协定
BOT	建设—经营—转让
BRICS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CETA	全面经贸协议
CFIA	经济合作和投资促进协议
CIL	习惯国际法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COMESA	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SR	企业社会责任
DTT	双重征税协定
EPZ	出口加工区
ETR	有效税率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ET	公平公正待遇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GFCF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VC	全球价值链
IIA	国际投资协定
IPA	投资促进机构

IPFSD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
ISDS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LDC	内陆发展中国家
M&As	并购
MFN	最惠国
MNE	跨国公司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EM	非股权模式
ODA	政府开发援助
PPP	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SEZ	经济特区
SDT	特殊与差别待遇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PE	特殊目的实体
SWF	主权财富基金
TPO	贸易促进组织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IM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条款
TTI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WIPS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内容提要

全球投资趋势

2014 年全球 FDI 流入下降。由于全球经济脆弱、投资者政策不确定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在 2014 年下降了 16%，降至 1.23 万亿美元。新增投资也被一些大规模撤资所抵消。

发展中经济体内向型 FDI 流量增加了 2%，增至历史最高水平 6810 亿美元。从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中扩大领先。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 接收国。在全球 FDI 接收国的前 10 位排名中，有 5 位来自发展中国家。

2014 年发达国家持续流入的水平较低。尽管跨国并购（M&As）有所复苏，但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 FDI 流量下降了 28%，降至 4990 亿美元。其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一项大规模撤资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发展中亚洲海外投资多于其他地区海外投资。前 20 大投资国中有 9 个国家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或转型经济体。这些跨国公司继续并购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海外附属子公司。

大多数区域性合作行动组织在 2014 年经历了流入的下降。参与商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国家集团占全球 FDI 流入份额有所下降。相反，东盟（ASEAN）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呈上升趋势，ASEAN 增加了 5%，达到 1330 亿美元，RCEP 增加了 4%，达到 3630 亿美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随着不断增加的行业自由化、不断增加的服务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中服务地位的不断提升，过去十年间 FDI 不断流向服务业。2012 年，服务业 FDI 存量占全球 FDI 存量的 63%，是制造业占比的两倍多。具有代表性的初级部门占总体行业的比重不到 10%。

2014 年跨国并购强劲反弹至 3990 亿美元。2014 年交易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总数由 168 起增加到 233 起，成为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撤资活动总额相当于并购总额的一半。

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额下降了 2%，降至 696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持续吸引了 2/3 的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额。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绿地投资持续不变。

特殊投资者 FDI 有所变化。在全球并购市场（2014 年并购额达到 2000 亿美元）中，私募股权基

金主要反映在大公司之间的交易。主权财富基金（2014 年 FDI 投资达 160 亿美元）越来越多的针对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速度在减缓；尤其是，跨国并购额下降了 39%，降至 690 亿美元。

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在不断扩张。2014 年国际生产有所增加，创造了大约 79 亿美元的附加值。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子公司的销售额和资产额增长远快于其国内附属子公司。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子公司雇佣了大约 7500 万的劳动者。

FDI 的复苏迹象明显。预期 2015 年全球 FDI 流入增加 11%，增至 1.4 万亿美元。预期 2016 年增至 1.5 万亿美元，2017 年增至 1.7 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的 FDI 预测计量模型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调查表明在未来几年 FDI 流量有所增加。预期未来三年（2015—2017），跨国公司的 FDI 支出占比将从 24% 增至 32%。2015 年跨国并购的趋势也将恢复增长。然而，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包括欧元区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冲突的潜在溢出效应、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固有缺陷，都会扰乱预期的复苏趋势。

地区投资趋势

非洲 FDI 流入维持在 540 亿美元左右。尽管非洲服务业 FDI 的份额仍然低于全球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 2012 年服务业 FDI 存量占地区总存量的 48%，超出制造业 FDI 份额（21%）的两倍以上。主要行业中的 FDI 存量占总体存量的 31%。

亚洲发展中国家 FDI 流入增至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 9%）。2014 年几乎达到了 5000 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全球最大接收国的地位。东亚和东南亚的 FDI 流入增加了 10%，增至 3810 亿美元。近几年，跨国公司通过跨境投资基础设施，在增强次区域的互联互通方面，已经成为一股主要力量。西亚的安全局势已经导致 FDI 流量连续六年下降（2014 年下降 4%，降至 430 亿美元）；在大部分地区不断增加的公共投资弥补了不断减少的私人投资。在南亚（增长 16%，增至 410 亿美元），制造业 FDI 有所增加，其中包括汽车行业。

在连续四年的持续增长之后，2014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FDI 流量下降了 14%，降至 1590 亿美元。主要源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并购的下降以及商品价格的逐步降低，抑制了 FDI 向南美洲的流动。较高的商品价格引起 FDI 流入的增加，之后 FDI 有所放缓，这可能会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一次机遇，为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重新评估 FDI 战略政策。2014 年转型经济体的 FDI 增加了 52%，增至 480 亿美元。地区冲突外加石油价格的下降以及国际制裁，已经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减少了地区投资者的利益。

发达国家 FDI 流入下降了 28%，降至 4990 亿美元。撤资和公司内部贷款的大幅波动降低了 FDI 流入，降至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流出稳定维持在 8230 亿美元。2014 年跨国并购活动势头强劲。迅速增加的 FDI 收入正在平衡贸易赤字，尤其是在美国以及近期的日本。

结构脆弱的小型经济体 FDI 流量有所变化。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 FDI 增加了 4%。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s）FDI 流入下降了 3%，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之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 FDI 流入增加了 22%，主要由于跨国并购销售额的增加。相比于其他金融来源，FDI 更具稳定性和多样化，FDI 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其仍然是这些经济体外部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间（2004—2014），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FDI 存量翻了两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FDI 存量翻了三倍。由于国际投资发展联盟的共同努力，结构脆弱的经济体 FDI 存量有可能在 2030 年再翻三倍。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多样化，这些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利用融资手段来增加更大的可恢复性和可持续性。

投资政策趋势

国家投资政策措施继续以加强投资促进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2014 年，80% 以上的投资政策措施旨在提升准入环境和降低投资限制；其中的焦点是投资便利化和特定部门的自由化（例如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新的投资限制措施多与国家安全和战略性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业、能源和国防行业）有关。

针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部门的相关投资措施仍然较少。2010—2014 年，只有 8% 的措施是专门针对私有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行业（基础设施、健康、教育和缓解气候变化等）。鉴于与可持续发展投资目标（SDG）存在差距（WIR14），各国必须保证集中力量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行业放宽投资渠道。

各国和地区也在继续寻求改革国际投资协议（IIA）体制的方法。2014 年签订了 31 项新国际投资协议（IIA），绝大多数包含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条款，其中加拿大是最活跃的国家（签署了 7 项新协议）。国际投资协议总量达到了 3271 项。同时，各国和地区也在考虑投资政策制定的新路径。为了降低对当前全球投资协定运作的不满情绪、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投资环境的变化，至少 50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对 IIA 模式的审议和修订。巴西、印度、挪威和欧盟公布了投资改革路径。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继续终止有关协定，同时制定新的 IIA 战略。

少数但越来越多的 IIA 包含了投资的准入前承诺。目前，约有 228 个协议提供了对“跨国并购”或“绿地投资”的国民待遇。绝大多数协议包括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和欧盟，也包括少部分发展中国家（智利、哥斯达黎加、韩国、秘鲁和新加坡）采纳这一承诺。

2014 年，共发生了 42 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案例，基于协议的申诉案件累积达到 608 件。发展中国家继续成为首当其冲的被申诉国，但针对发达国家的案件比例有所上升。绝大多数申诉者来自发达国家。2014 年完成了 43 项裁决，使结案总数达到 405 项。其中，国家胜诉比例为 36%，投资者胜诉比例为 27%；剩余案件可能已解决或已中止。

重构国际投资体制：一份行动计划

当前，IIA（国际投资协定）体制亟需系统性改革。从众多国家与地区中的热议及议会听证会可见，对 IIA 体制进行改革，以确保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逐步达成共识。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改

革，而在于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力度。本报告为上述改革提供了一份行动计划。

IIA 改革可以借鉴 60 年来制定 IIA 规则的经验教训：(1) IIAs 有副作用并且可能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因而相应的保障措施应当到位；(2) IIAs 作为投资促进工具，有其局限性，但同时也有未充分利用的潜力；(3) IIAs 在政策、系统一致性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IIA 改革应处理好五个主要挑战。IIA 改革应着力于：(1) 在公共利益方面保障监管权力，以避免 IIAs 在国家主权上的有限界定不正当地约束公共政策制定；(2)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问题；(3) 有效扩展 IIAs 中投资促进与投资便利化的内容；(4) 确保负责任投资，最大化外国投资的积极影响并最小化其潜在的负面影响；(5) 加强 IIA 体制的系统一致性，以克服当前体制中存在的空白、重复及不协调等问题，并协调投资关系。

UNCTAD 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政策选择。本报告阐述了针对 IIA 基本要素的政策选择，其中的一些改革措施可结合或调整以满足不同的改革目标：

- 保障监管的权力。政策选择包括澄清或界定最惠国 (MFN) 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 (FET)、间接征收以及例外 (如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 等条款的内容。
-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政策选择包括：(1) 改革现行 ISDS 中的临时仲裁机制，同时保留其基本结构；(2) 替代现行的 ISDS 仲裁体系。前者可通过修改现行机制 (例如，改进仲裁程序，限制投资者的进入，利用筛选机制，引入当地的诉讼要求) 以及加入新的元素 (例如，增加高效且可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或构建上诉机构) 来实现。如果主权国家希望替代现行 ISDS 机制，则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创建常设国际投资法庭，或依靠国家—国家和/或国内争端解决方式。
- 投资促进及投资便利化。政策选择包括增加促进内向型投资和外向型投资的条款 (例如，东道国措施和母国措施)，以及共同的地区投资促进条款，包括任命投资便利化巡视员。
- 确保负责任投资。政策选择包括增加而非降低标准条款，缔结关于投资者责任的条款，如与国内法一致及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条款。
- 加强 IIA 机制的系统一致性。政策选择包括提高 IIA 机制的协调性，合并、简化 IIA 网络，协调 IIAs 与其他部门国际法的相互作用，将 IIA 改革提上国内政策议程。

当实施 IIA 改革，在为投资提供保护与便利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保障监管权力的最有效方式。为此，他们需要考虑上述政策选择的多重影响。一些改革政策选择的结合使用也许会出现反效果，甚至达成违背传统投资保护理念的条约。

从程序上来看，IIA 改革行动应在国家、双边、区域、多边层面上同步。在上述各层面上，改革程序包括：(1) 评估现状并识别问题；(2) 为改革制定策略与行动计划；(3) 实施计划并实现目标。

利用 IIAs 实现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聚焦于关键改革领域并遵循多层次、系统且全面的方法，应当是上述改革程序的指导目标。由于尚未达成一个多边体系，同时考虑到现行 IIAs 数量之大，使 IIA 体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方法是，以全球支持结构来共同改革该体制。通过政策分析、对各层面上不同程序的协调、与其他部门法的相互作用、技术支持以及建立共识，该结构能为 IIA 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UNCTAD 在这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采取共同的方法，才能保证 IIA 体制的稳定性、明确性、可预测性，从而有助于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有效利用国际投资关系，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协调一致

国际社会正围绕跨国公司的财政贡献做激烈的辩论和巩固政策的工作。焦点主要集中于避税——尤其在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上。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需要持续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融资需求。因此，现阶段对避税行为采取行动政策势在必行，旨在支持国内资源流动以及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性投资。

UNCTAD 预计，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每年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贡献约为 7300 亿美元。平均而言大约是企业总贡献的 23% 和政府总收入的 10%。这一贡献的相对大小（和构成）因国家和地区而异。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贡献超过了发达国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外国企业的贡献（平均而言，非洲国家政府财政预算的 14% 依赖于外国企业的经费支出）。

更进一步讲，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低，它对跨国公司贡献的非税收入的依赖性就越大。平均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海外子公司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特许使用费、关税、工资税和社会贡献以及其他税收对东道国的财政贡献是其公司收入所得税贡献的两倍多。

跨国公司通过跨境投资的方式构建其企业结构。他们在自身商业和操作需求的约束下，以最为节税的方式来完成构建。因此，FDI 的规模及流向经常受到跨国公司对税收考虑的影响，因为其投资的结构和形式将可能为其以后的投资收入带来避税的机会。

一个有关避税的投资观点集中于离岸投资中心作为全球投资的主要参与者所起到的作用。据统计，约 30% 的跨国公司投资存量是先通过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再作为生产性资产流向目标国的。（UNCTAD 的 FDI 数据库删除了与此相关的重复计算的影响）

尽管其他因素也起到了支持作用，但离岸中心在全球企业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通过各司法管辖区的税率差异、立法错配和税收协定，跨国公司使用一系列手段得以避税。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包括复杂的多层企业结构。其中有两种基本避税手段最为突出：（1）无形资产转移定价手段；（2）融资方式。这两种手段作为避税措施的相关部分典型代表，充分利用了设立于离岸投资中心的实体投资结构——投融资手段尤其依赖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是与所有国家相关的全球性议题：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利润转出，因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限制或专业技术缺乏，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避税行为。

跨国公司的避税措施将造成发展资金的巨大缺口。发展中国家估计每年约 1000 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损失直接来源于离岸中心的内向型投资存量。通过离岸中心投资的东道国的内向型 FDI 存量与已披露的 FDI 回报率（可纳税的）之间有明确的相关性。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实现的投资越多，则应纳税利润的增加就越少。平均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每增加 10% 的离岸金融中心投资将减少 1% 的应纳税利润，并且这个平均值还未考虑国别差异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的大量减少。这一现象隐含着不同地区间税收收

入分配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因此需要重视。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存在税收征管能力有限、税收收入来源更为依赖公司投资者以及离岸中心投资日益增多等特定问题。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解决避税问题，并认真考虑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当前，离岸投资中心作为全球 FDI 融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国际投资流动中扮演着系统性角色。在国际层面上，任何可能影响离岸投资中心投资便利化功能或者投资便利化手段的措施（例如：税收协定），都必须从投资政策视角考虑。

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反避税讨论对投资政策的关注十分有限。然而若要使公司结构的设立易于实现避税，投资便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任何解决避税问题的方案中，投资政策都应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协调一致的指导方针或将有助于实现投资政策与反避税措施之间的协同效应。主要目标包括：遏制以激进税收筹划作为促进投资手段的行为；认真研究反避税措施对投资的潜在影响；以合作的方式确认东道国、母国和导管公司所在国的共同责任；管理国际投资和税收协定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投资及财政收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提高发展中国家解决避税问题的能力。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展示了大量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融资需求，同时展示了 FDI 在收缩投资缺口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强化全球投资的政策环境（包括 IIA 和国际税收制度）。IIA 和国际税收制度是相互联系且各由 3000 多份形似“意大利面碗”的双边协定组成。它们既相互关联，也面临共同的挑战。彼此又是相互改革的对象。尽管 IIA 和国际税收制度都各有其具体的优先改革事项，但是考虑它们改革的联合议程仍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扩大覆盖面、优化监管、增强一致性以协调国际税收和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除了避免其发生冲突外更应使其相互支持。基于此，参与国际投资与发展的团体应当、也能最终建立起一个使各方均受益的全球投资合作共同框架。

目 录

说 明.....	1
序 言.....	1
鸣 谢.....	1
缩 略 词.....	1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国际投资趋势	1
一、目前趋势	3
二、国际生产趋势.....	19
三、前景	23
第二章 FDI 地区趋势	29
引 言	31
一、地区趋势	33
二、结构脆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发展趋势.....	91
第三章 近期政策发展与核心议题	119
一、国别投资政策.....	121
二、国际投资政策.....	124
三、投资争端解决.....	131
第四章 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一份行动清单	137
引 言	139
一、60 年来 IIA 规则制定及经验教训	140

二、战略方针与政策选择	146
三、调整现行 ISDS 机制	167
四、IIA 改革：指导方针和行动	183
第五章 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	193
引言：势在必行的税收与投资政策	195
一、MNEs 作为政府发展的收入来源	198
二、国际税收的投资视角	206
三、MNE 税收规避和发展中国家	216
四、税收和投资政策制定：为了加强一致性的提案	220
结语：改革国际投资的治理	230
附 录	238
译后语	291